

翟理斯《中国文学史》中的维多利亚精神及其矫正*

余夏云

摘 要：作为英语世界第一部中国文学史，翟理斯的《中国文学史》是在全球政治文化语境中完成的。他广泛调动和对话欧洲文化资源，尤其是维多利亚时代的科学、政治话语，并结合自己侨居中国的历史经验，发展出一种特别的集缀讲史的方案。他以松散的章节编排串联作家作品，同彼时流行的进化论、社会决定论和历史主义话语拉开距离。与此同时，他采纳维多利亚时代的性别观和文学观，凸显女作家、小说、戏剧以及作家童年经历的重要性。尽管他未对文学做出明确定义，却有力传递了对文学功能论及传记批评的支持。虽然《中国文学史》瑕瑜互见，但它为广泛而历史地思考“中国文学”开启了有益的通道。

关键词：翟理斯 《中国文学史》 维多利亚精神 集缀叙事 重复原则

1901年，英国威廉·海涅曼公司（William Heinemann）推出了一本厚达448页的《中国文学史》（*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以下简称《文学史》）。该书系作家兼批评家埃德蒙·戈斯（Edmund Gosse）主编的“世界文学简史丛书”（*Short Histories of the World Literatures*）的第10种，作者是时任剑桥大学第二任汉学教授的翟理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英语世界中国文学史书写的历史、形态和跨文化政治研究”（18BZW153）阶段性成果。

斯 (Herbert Allen Giles)。^①翟在序言中自诩,本书是世界范围内中国文学史写作的首次尝试。^②尽管迹来的研究已经指出,俄人王西里 (Василий Павлович Васильев)^③早在1880年便拔得头筹^④,出版了《中国文学史纲要》(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китай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⑤,但是,翟的著作行销甚广,至少有1901、1909、1915、1923、1924、1927、1964、1973、1974、2008、2014年版等众多版次^⑥,其影响之巨,远非前者能够望其项背。百余年来,学界对这部所谓的“第一之作”,探讨既广,当中更不乏林语堂、梁漱溟、郑振铎等名家的评论^⑦。不过,这些研究通常就事论事,侧重做内部的观察,而未及将它与更广阔的历史、文化语境关联起来。然而,翟的尝试不是孤例,本文尝试在全球史的视角下对它加以重勘。

① 参见葛桂录主编《中国古典文学的英国之旅——英国三大汉学家：翟理斯、韦利、霍克斯》，郑州：大象出版社，2017年，第90页。事实上，有关《中国文学史》的初版时间，学界一直存在分歧，简要的总结参见徐静《镜像与真相：翟理斯〈中国文学史〉研究》，2010年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第33页。

② Herbert Allen Giles,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New York: D. Appleton and Company, 1927, p.v.

③ 王西里又作瓦西里耶夫，系统的研究参见赵春梅《瓦西里耶夫与中国》，北京：学苑出版社，2007年。

④ 方维规曾撰文指出，世界范围内的第一部中国文学史，应为德国人肖特 (Wilhelm Schott) 于1854年出版的《中国文学论纲》(Entwurf einer Beschreibung der chinesischen Literatur)。参见方维规《世界第一部中国文学史的“蓝本”：两部中国书籍索引》，《世界汉学》2013年第12卷。

⑤ 经典的论述参见李福清《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在苏联：小说·戏曲》，田大畏译，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1—3页；李明滨《世界第一部中国文学史的发现》，《北京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阎国栋《俄国汉学家王西里的中国文学观——对世界首部中国文学史专论的思考》，《文学遗产》2014年第6期。

⑥ 尧育飞：《翟理斯〈中国文学史〉中译本简述》，《书屋》2019年第7期。部分出版信息参见刘亚迪《翟理斯〈中国文学史〉的文学史观和文体观》，2016年北京外国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第50—52页。

⑦ 系统的总结参见徐静《镜像与真相：翟理斯〈中国文学史〉研究》，2010年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第1—9页；刘亚迪《翟理斯〈中国文学史〉的文学史观和文体观》，2016年北京外国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第2—4页。

一、“世界中”的中国

翟的《文学史》隶属于“世界文学简史丛书”，这一点与王西里的《中国文学史纲要》一样。王著也是俄国历史上第一套大型丛书——“世界文学史丛书”的一种，主编为俄国著名报人兼文学史家科尔什（В. Ф. Корш）。^①无独有偶，郑振铎提醒我们，截至20世纪20年代，英美各国已推出不少世界文学史丛书，著名的有伦敦T. Fisher Unwin公司的“文学史丛书”（The Library of Literary History）。这套书涵盖“印度、爱尔兰、美国、波斯、苏格兰、法兰西、亚拉伯、俄罗斯等国的文学史”^②。除了大型丛书，单行本的“世界文学史”著作亦不在少数。郑振铎在《〈世界文学〉》一文中便提及美国作家博塔（Anne Charlotte LynchBotta）的*Handbook of Universal Literature*（1860），以及李查孙（John William L. Richardson）和渥文（Jesse M. Owen）的*Literature of the World: An Introductory Study*（1922）。^③而在早些时候，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及其前辈已经尝试使用“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来描述关乎“精神贸易”的现象、态度和行为^④，随后马克思、恩格斯更将其指认为一种必然的历史趋势，是一个与全球经济一体化同步的进程。“历史学家把全球性意识的谱系追溯到16世纪。”^⑤1974年，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提出“世界体系”

① 参见阎国栋《俄国汉学家王西里的中国文学观——对世界首部中国文学史专论的思考》，《文学遗产》2014年第6期。

② 郑振铎：《俄国文学史略·序》，《郑振铎全集》第15卷，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415页。

③ 郑振铎：《〈世界文学〉》，《郑振铎全集》第15卷，第182—184页。郑振铎在文中称博塔一书的“初版还在一八八四年”，但就笔者目前所见，该书在1860年即由纽约Derby and Jackson出版社出版。另外，有关20世纪20年代西方的世界文学史著作名单可参见张珂《一本书的未尽中国缘》，《中国图书评论》2011年第7期。

④ 方维规：《起源误识与拨正：歌德“世界文学”概念的历史语义》，《文艺研究》2020年第8期。

⑤ 〔德〕S.康拉德：《全球史导论》，陈浩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153页。

(worldsystem), 亦主张“在16世纪之后, 我们已经不能再用国家、社会与发展理论的方式”来理解资本主义体系。^① 尽管沃勒斯坦的发言, 是基于对欧洲共同市场的观察, 他将其他各洲排除在外, 有着明显的局限性, 但无论如何, 这说明“世界”在大航海之后, 已经成为人们理解现实的重要视域。而迟至17世纪, 中国显然也感受到了这股“世界”浪潮。多米尼克·萨克森迈尔(Dominic Sachsenmaier)甚至指出, 一个从未旅行之人也可能深嵌全球性的网络, 并不得不做出必要的在地调试和跨文化平衡。^②

从经济到文学的各种例子表明, 翟于20世纪初撰写中国文学史以配合“世界文学史”计划, 早已不是孤立的个体自觉事件, 相反, 他为一个时代的潮流所牵动。正值此刻, 中国国内传统的国家观念也发生转变, 开始向现代的民族国家观念靠拢, 其重要的标志是“天下”“万国”等烙有华夏中心主义的词汇被内蕴流变特质的“世界”一词所取代。^③ 瑞贝卡·卡尔(Rebecca E. Karl)形象地将此民族、国家联袂兴起的过程描绘为“展演世界”(staging the world)。^④ 表面上, “世界文学史”以一视同仁的方式并列诸国文学, 勉力提升大家的能见度, 有相当的现实意义, 但从根本上说, 它施行普世主义, 意图用“民族国家”这一统一的西方计量单位来定性他国形象, 整合异质文明, 严重忽略了历史的多样性和地方的特殊性, 从而带有帝国主义色彩。以日本为例, 明治维新以后, 它广泛接受西方影响, 主张脱亚入欧。这一时段, 国内涌现出大量中国文学史著作。这些作品在援引西方文学史体例的同时, 也连带引入其民族主义意识——以中国文学为参照,

① 廖炳惠编著:《关键词200:文学与批评研究的通用词汇编》,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61页。

② 参见〔德〕多米尼克·萨克森迈尔《在地之人的全球纠葛:朱宗元及其相互冲突的世界》,张旭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2年。

③ 参见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年。

④ 参见〔美〕卡尔·瑞贝卡《世界大舞台: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中国的民族主义》,高瑾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

追溯本国文化传统，视中国文学史为工具。极至处，甚至有论者主张“西洋人对于中国文学的研究领域尚未开辟”，而“中国人自身缺乏概括能力，对当前的学术动向亦无从辨析”或干脆“没有编写的资格”，所以“若果然编写中国文学史，也只能由我邦人来担任”^①——民族的优越感溢于言表。

众所周知，文学史和民族主义同步发生。日本汉学的例子进一步表明，文学史编撰，其实对象无分内外，都关涉民族主义。对他者的包容，一定程度上，暴露出写作者自以为是的上位姿态。这一点也可以从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相关操作中窥见端倪。其人对别国文学的描述，初衷是以实证的方式推论本国文学无远弗届的影响力，本质仍是自我中心论。据此，我们说：“世界中”的过程，不只要面向一个客观的地理构造，更是介入一种现实的政治结构。写作是权力部署的形式或结果。虽然我们不必忙着把翟的文学史归为一种政治书写，但需要充分意识到它内蕴的政治性。亦即《文学史》作为全球一体化进程中的文化事件，它不可避免地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并或多或少地与之构成张力和对话。

过去我们常把重心放在梳理“文学”内涵的流变之上，借镜“观念史”或“概念史”，推敲今日“文学”之成立乃是基于时人不间断地调动、调试各种因素所得。^②当中，传统的“文学”观和近代西方的“literature”理念，是最重要的参照对象。这种系谱学式的排查，虽然充满洞见，却留下两个遗憾。第一，是未对“中国”的流动性，尤其是它和“世界”的对话关系做出有效揭示，仅视“中国”为固定不变的概念或无足轻重的修辞词。第二，缺少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所谓的“互反比较”（reciprocal comparison）。这种方法，意在破解单向的思维模式，承认比较双方可以相互参照，彼此都有普遍性和特殊

① 转引自赵苗《日本明治时期刊行的中国文学史研究》，郑州：大象出版社，2018年，第42页。

② 有关英国的中国文学观念流变，参见张源《英国早期中国文学史纂与英语世界“中国文学”观念之演进》，《河北学刊》2021年第5期。

性，而不应以其中一者作为规矩绳墨。^①我们对“文学”内涵的探求，每每以它和当下“文学”的差异为依据，从而得出“杂文学”“大文学”“准文学”的结论。这些结论固然点出不同时代文学的特质，但是，不免有以今律古的嫌疑。“互反比较”鼓励我们在追问过去的文学为何呈现泛化特质的同时，也应覃思为何今日的文学会有窄化、纯化的趋势，而不如过去那般包容既广？我们知道，彭慕兰的思考，其实肇因于他对全球经济状况的把握。“互反比较”的实质，是回向中国和世界的对话，尝试理解“世界”对于发现“中国”的意义。

二、字典化的“科学”

就翟的写作语境而言，他所应对的“世界”可能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政治层面的“黄祸”论述（Yellow Peril）；第二，是自然科学领域的达尔文主义；第三，是人文科学研究中的历史主义。

其中，“黄祸论”酝酿于19世纪四五十年代的西方，于90年代进入传布的高潮期。其主要的理路不外“人种威胁论”“人口威胁论”“文明威胁论”“发展威胁论”和“军事威胁论”几种范式。^②它沿用“东方主义”的表述方案，将西方世界“对当下和未来的‘恐惧’附着在人种等级化的话语上”^③，系统贬抑东亚。原本对他者的污名化，是“优越的欧洲”的典型表现，可“黄祸论”在本质化东亚的同时，也吊诡地将欧洲放置在受害者的位置上，扮演一个弱者，造出了“受威胁的欧洲”形象。^④这种颠倒黑白的操作，说明帝

① 参见李伯重《序》，〔美〕王国斌、〔美〕罗森塔尔：《大分流之外：中国和欧洲经济变迁的政治》，周琳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4页。

② 参见罗福惠《非常的东西文化碰撞：近代中国人对“黄祸论”及人种学的回应》，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8—14页。

③ 孙江：《人种：西方人种概念的建构、传布与解构》，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115页。

④ 有关“优越的欧洲”和“受威胁的欧洲”的讨论，参见杨瑞松《病夫、黄祸与睡狮：“西方”视野的中国形象与近代中国国族论述想像》，台北：政大出版社，2010年，第69—70页。

国主义的发展遭遇内部难题，而不得不将之外化。通过塑造“将来完成”时态的公敌，他们尝试缓解内部的矛盾，攘外安内。在“黄祸论”的宣扬和制造方面，法、德两国用力最勤。此中关键正是他们受到新兴的俄国、美国的威胁，利益受损，产生强烈的没落感，而将矛头指向中国和日本。相较之下，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势力如日中天，所以把“黄祸”威胁看得较轻。但是，中日甲午战争之后，英国的态度改变。面对日本的崛起，他们惊恐地发现：“这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即直到目前欧洲借以统治亚洲的军事、工业和行政管理上的种种发明，将反过来用以对付原来的发明人。”有鉴于此，他们主张“设法阻碍和延缓中国刚刚起步的工业化运动”，以免“中国人依靠‘西方科学的帮助’，办起各种工厂，就会同西方产生严重的竞争”。^①

“黄祸论”势力所及，英国人视华人“比上帝所创造的任何种族都要低劣”：他们野蛮排外，拥有“根深蒂固的偏见”，“在一切环境中 and 一切变化之下仍然保持着他们独有的民族特性”，甚至“已经达到了四千年的罪恶的顶点”，“同中国人接触就会使我们退化并且阻碍我们的成长，或许永远会威胁我们和影响我们”。^②这类偏激的论述深入人心。1876年，当翟推出《中国概览》（*Chinese Sketches*）时，已深感有必要对此做出澄清。他在序文中指正：西方人普遍认为“中华民族是个不道德的退化的民族，他们不诚实，残忍，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来使自己堕落”，事实上是一种误解。他以自己的在华经历证明“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劳、清醒、乐观的民族，西方人追逐财富的恶习会带来文化灾难，而中国人能够保存中和适度的习惯”^③。

① 罗福惠：《非常的东西文化碰撞：近代中国人对“黄祸论”及人种学的回应》，第60、62、61页。

② 吕浦、张振鹏等编译：《“黄祸论”历史资料选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25、31、22—23、28、34页。

③ Herbert Allen Giles, *Chinese Sketches*, London: Trübner, 1876, preface, 引文转自葛桂录主编《中国古典文学的英国之旅——英国三大汉学家：翟理斯、韦利、霍克思》，第53页。

翟在华工作 25 载（1867—1893），是“侨居地汉学家”^①的重要代表。他对中国抱有了解之同情，并不令人意外。^②但区别于 1876 年对中国明确笃定的维护，1901 年的《文学史》采用了“作者隐身”的立场。他接受戈斯的建议，用更多的翻译而非个人陈述，来揭示中国文学的特征。^③主编的判断，可能和此时“黄祸论”在英国进入实质性阶段有关。义和团运动高举“扶清灭洋”的旗帜，使得英国原本乐观看待中国觉醒的态度急转直下，变为一种恐惧。他们视起义为阴谋，大肆鼓吹，连续推出《黄色浪潮》（*The Yellow Wave*）和《当东方遇见西方》（*When East Meets West*）等描写“亚洲入侵”的作品。臭名昭著的辱华形象“傅满洲”正是于此际流行并直抵人心。^④翟在“黄祸论”愈演愈烈的当口，主动避让，不失为明智之举。他述而不作的态度，有助于公众，尤其是对中国文学怀有兴趣的读者，做出自己的判断。但除此而外，我们可以想象，翟的隐忍克制，也可能与他秉持的“科学”研究态度有关。“科学”（science）本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它一度与 art 通用，泛指一切知识（knowledge），直到 19 世纪中叶才真正确立起以“是否具有客观性（objective character）”^⑤为自身重要的判别标准。维多利亚时代，科学日昌，与文学的关系也更加紧密。它甚至与“小说”构成“文化孪生子”（cultural twin），彼此以“真理、客观、克己”为

① 有关“侨居地汉学”的扼要介绍参见王国强《“侨居地汉学”与十九世纪末英国汉学之发展——以〈中国评论〉为中心的讨论》，《清史研究》2007 年第 4 期。

② 更多的细节参见傅佛果（Joshua A. Fogel）为翟理斯《中国概览》（*Chinese Sketches*, 1876）和《中华文明》（*The Civilization of China*, 1911）两书合印本所写的新导言（Introduction），in Herbert A. Giles, *A. Giles and China: Two Early Classics of Modern Sinology*, Kumamoto: Kurodahan Press, 2017. 英文版参阅 <https://www.kurodahan.com/wp/e/articles/c0001arte.html>（2023 年 7 月 23 日读取）；中译文参见熊文华《英国汉学史》，北京：学苑出版社，2007 年，第 97—100 页。

③ Herbert Allen Giles,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p.v.

④ 参见〔美〕罗斯·福曼《中国与维多利亚想象：缠绕的帝国》，张涛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22 年，第 148—152 页。

⑤ 〔英〕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年，第 425 页。

最高的美学理想，形成共鸣。^①

《文学史》在编排上缺少内部关联，一望可知。全书以朝代为序，通过松散的个案组合谋篇布局。词条式的编撰方式，不难让人想到翟在离开中国前所进行的两项重要工作——编写《汉英字典》(*A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和《古今姓氏族谱》(*A Chinese Biographical Dictionary*)。翟自诩两部著作均致力于帮助外国人快速、准确地掌握汉语。^②但其实，《古今姓氏族谱》少有字词的讲解，更多的是对中国历史人物的介绍。其中涉及的作家和批评家不下150位。^③但无论内容如何，这两部著作已经显示翟对客观性和准确性这两个科学原则的在意。除了前期的铺垫工作，翟在《文学史》具体章节的设置上，也有意贯彻对“科学文献”的推崇。比如，在汉代部分，他讨论了“词典编纂”(lexicography)；在论及宋代文学时，又专辟一章讨论“字典、百科全书和法医学”(“Dictionaries, Encyclopedias, Medical Jurisprudence”)；明朝文学则重点关注中医学(*Materia Medica*)和农学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Agriculture*)。过去我们认为翟如此操作，表明他对“文学”的定义较为宽泛，体现了一种“杂文学”观念。但是，转从叙述学的角度来讲，他对字典、百科全书以及医、法、农等著作的关注，毋宁代表他对此类“文学作品”的表述方式或背后的价值观念持肯定态度。有心人不难注意到，就在《文学史》出版的同年，翟为杂志《十九世纪及未来》(*Nineteenth Century and After*)撰文介绍《永乐大典》，题目是“Encyclopedia Maxima”。^④1910年，他还曾应新版《大英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Britannica*)副主编之邀，撰写“中

① 参见陈礼珍《盖斯凯尔小说中的维多利亚精神》，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113页。

② 参见王绍祥《西方汉学界的“公敌”——英国汉学家翟理斯(1845—1935)研究》，2004年福建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第254页。

③ 参见葛桂录主编《中国古典文学的英国之旅——英国三大汉学家：翟理斯、韦利、霍克思》，第85页。

④ 同上书，第95页。

国艺术、语言、文学和宗教”词条。^①尽管整个写作过程仓促，内容也并非由他个人独立完成，但是，他深深介入到以“百科全书”为代表的现代知识生产体系中，已不容置喙。区别于18世纪的长篇百科全书传统，19世纪英国“树立起短小精悍、语言直白却又不失学术客观性的新典范”^②。以钱伯斯兄弟（William Chambers & Robert Chambers）为代表的出版商，勉励推进“知识建构民主化”，“将‘信息’分解为较之研究论文更短小、易读的单元词条”，以适应大众而非精英的阅读口味。^③翟深知知识的普及，关键动力是科技发展。他在《文学史》中屡次提及造纸术、印刷术等技术变革对文学的推动之功。这明显回应了维多利亚时代的科学崇拜思潮。

不过，翟一壁推崇“科学”所代表的客观、精确原则，一壁又与当时更具影响力的“知识型”“达尔文主义”保持距离。达尔文（Charles Darwin）提出“自然选择”（natural selection）的进化论观点，显然没能在《文学史》中得到应用。翟刻意淡化历史背景，模糊作家作品之间的联系，尤其无心说明几千年的文学发展，有一种渐积而至的进步。他在最后一章论及晚清文学时，毫不客气地批评：“在中国，现在这个时代没有看见任何文学分支领域出现原创的伟大作家，也没有看到任何值得流芳后世的伟大原创作品产生。……现存的中国文学规模把他们压倒了，他们毫无希望去比肩，更不要说去超越那些已经逝去的不朽人物。”^④翟对“进化论”的回避未必出于无知，相反，可能表明他对不加约束地施用该理论进入社会学、伦理学、文学等领域保持警惕，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预示了科学至高无上的风潮之下，另一股

① 参见葛桂录主编《中国古典文学的英国之旅——英国三大汉学家：翟理斯、韦利、霍克斯》，第105页。

② 参见刘松鑫、武玉红、袁曼书《书籍与文明：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知识生产与人文景观》，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141页。

③ 同上书，第145页。

④ [英]翟理斯：《中国文学史》，刘帅译，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312页。以下凡引自本书者，均不另注，仅随文给出页码。

文化冲动已呼之欲出，那便是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分离。^①

三、作为经验的“文学”

当然严格推论起来，翟并非与“进化论”完全绝缘。只是他将达尔文在时间轴上的观察空间化了。在他看来，东西之间的文化差异具有阶段性。这是他受了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的影响所致。泰勒的名著《原始文化》（*Primitive Culture*）不仅对“文化”做了最早的现代定义，也为“文化进化说”（*culture evolutionism*）奠定根基。在书里，泰勒提出著名的“泛灵论”（*animism*），并指出随着人类文化的不断进化，“泛灵论”看似销声匿迹，但并非无迹可寻。作为一种人类文化的遗存（*survival*），它妥善地保存在某些原始部族之中。当我们定睛于这些蛮族，某种层面上就等于看到了人类文明的“童年”。泰勒将这种借“文化他者”来推知人类共同“原始文化”的做法视为“文化科学”（*science of culture*）。翟曾一度采信此说，并用于翻译《聊斋志异》。他试图在这部充满民俗色彩的作品（*folklore*）中捕捉人类文明的早期遗存，“科学”地推论不同文明间的关联。王胜宇总结说，翟的翻译出色地在“科学改写”（*a scientific rewriting*）和“文学改编”（*a literary reworking*）之间取得了平衡。^②

如果说王胜宇的研究指出了“文化科学”产生的学理依据，那么，当我们把问题引向政治层面，尤其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国民性思考时，将明了这个学术领域的“推测范式”（*conjectural paradigm*），其实是当时政治文化影响下的产物。作为一个拥有多民族和多殖民地的王国，英国如何能做到“多元一体”而无伤君主政体，是维多利亚人

① 参见萧莎《英国维多利亚意识形态研究：福音主义与达尔文主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年，第195页。

② Shengyu Wang, “Chinese Folklore for the English Public: Herbert A. Giles’s 1880 Translation of Pu Songling’s Classical Tale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Vol.73, 2021(4), pp.442-462.

界说国民性的要点所在。英国人刻意强调文明的“一元普世”来表示“多元并举”不过表象。从本质上，人类的品性大体相同，但达成文明的节奏却有迟速之别，因此不免产生等级或阶梯。同欧陆国家以多元民族性为基础的启蒙论相比，这种“一元论”更加凸显唯我独尊的岛国性。^①但无论是出于“科学”立场，还是政治影响，我们都清楚地看到：当1901年翟撰写有关《聊斋志异》的内容时，已彻底放弃了1877年翻译该作时强调的“民间色彩”，转而从“简洁的风格”“深奥的用意”等角度展开介绍，明白无误地与“文化进化”的观点保持疏离，投射出一种意欲剥离“文学”和“科学”的冲动。或者换句话说，他尝试探索“文学”自身的个性，而非附着性。

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进一步参考他对当时主流文学史观或历史观敬而远之的态度来做说明。韦勒克（René Wellek）指出，维多利亚时期“文学史编修可以用两种对立的观念来讨论：第一是若干世纪以来那种认为文学是由一连串孤立的作品构成与那种认为文学史的核心是连续性与不断发展这两种观点的对立；第二种（特别是在维多利亚时期）是那种试图将文学史与自然科学方法和结果等量齐观的思想与那种试图采用唯心论哲学传统概念的思想二者之间的对立。从上述两种对立观念的相互交织中，我们可以得到四种主要类型的文学史：科学的与静态的、科学的与动态的、唯心的与静态的、唯心的与动态的”^②。在这四种类型中，“那些认为文学完全是由社会背景决定的”^③和主张“文学史是民族精神史”^④的论点最具生命力。前者将动态和科学的观念发挥得淋漓尽致，而后者则在唯心主义的层面上，呈现了一个与时代诉求若合符节的声音。前者的重要代表是法国批评家泰纳。他因提出“种族、环境、时代”（la race, le milieu, le moment）的三要

① 参见萧莎《英国维多利亚意识形态研究：福音主义与达尔文主义》，第30—34页。

② 〔美〕勒内·韦勒克：《辨异：续〈批评的诸种概念〉》，刘象愚、杨德友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37页。

③ 同上书，第139页。

④ 同上书，第144页。

素说而见知于世。在泰纳看来,文学是历史有机体的重要组成,“受制于社会,反映着社会”^①。他采用实证主义的方法,系统研究艺术史和文学史,在多样的事件中寻求“一个统辖所有事件总类而非仅仅是个别事件、所有宗教或文学群体而非一种宗教或文学的基本法则”。三要素中,他尤其在意“种族”的作用,认为其“是导致历史事件发生首要并最为充分的根源”,且“很少受环境迁徙和时代变革的影响而发生根本的改变”。^②这种遗传决定论,虽然与环境 and 时代联动,赋予了“文学”动态,指明它不间断转变的原因和过程,但毕竟因为缺少对个性或主体的观察,而留下不少问题。

作为修正,“历史主义”强调个性而非规则。它提出历史的要义是“秉笔直书”(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不做判断。^③而“直书”的重点是要“注意文化的生成都有其对应的时空条件,今人不能以今律古、以己度人”^④。陈寅恪的名句“了解之同情”典出于此。他借镜德国批评家兼哲学家赫尔德而有此说。^⑤虽然“历史主义”并非由赫尔德发明,但他确是这个思潮的主要推动者。^⑥赫尔德思想复杂,其中最为所知的成绩是“创造了民族精神(Volksgeist)的概念,并且第一个承认社会心理学的考察对正确的历史理解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⑦。在赫尔德看来,“民族精神”“是民族和国家最有生气的根基,因此也是有机的基础。统合了不同族群共同体的国家并不拥有这种精神联结,从而缺乏内在生命。这类国家不过是机械装置,所以自始就注定了政治上的

① [美] 勒内·韦勒克:《批评的诸种概念》,罗钢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51页。

② 有关泰纳文学主张的扼要介绍参见陈广宏《中国文学史之成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93—96页。三处引文均转引自该书第95页。

③ [美] 格奥尔格·G.伊格尔斯:“中文版前言”,《德国的历史观:从赫尔德到当代历史的民族传统》,彭刚、顾杭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5年,第3页。

④ 王晴佳、李隆国:《外国史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30页。

⑤ 参见陈怀宇《陈寅恪与赫尔德:以了解之同情为中心》,《清华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

⑥ 参见王晴佳、李隆国《外国史学史》,第229页。

⑦ [美] 斯皮茨:《自然法和赫尔德的历史理论》,冯庆编:《历史主义与民族精神:启蒙语境中的赫尔德》,姚啸宇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21年,第29页。

衰亡”。赫尔德移用生物学的观点，强调民族国家的有机性或自决性，并主张“语言是塑造国族性格的决定性要素”。^①人们将这种观点定性为“文化民族主义”，而非“政治民族主义”。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说：“赫尔德这种学说的真正后裔并不是权力政治学，而是被称作民粹主义的东西。……它激发的不是国家干涉主义者，而是‘草根’的信仰者——俄罗斯的斯拉夫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基督教社会主义者，以及一切民间艺术和大众传统的崇拜者。”^②

尽管《文学史》述及寓言、戏剧、谚语、笑话等“民间文学”，并在戏剧部分花费不少笔墨，可翟的出发点显然是要为“戏剧”这个西方文类寻找中国对应物。他的重心是官化和文人化的戏剧，并无意从中提炼出一种“民族精神”或一般的“历史规律”。他散漫地排列作家作品，且对相关的背景缺少基本的介绍，根本无助于读者把握文学和时代的关系，更遑论印证泰纳式的决定论。就此而言，《文学史》呈现的是一种静态的文学观。它与西方早期的文学史著作在形态上具有高度相似性，大体上是一种“史料汇编”。韦勒克在《近代文学批评史》中指出，直至18世纪后期，“文学史大抵只是些传略和文献性质的资料堆积，是原材料的大型仓库”^③。托马斯·沃顿（Thomas Warton）的《英国诗歌史》（*History of English Poetry*）作为“第一部初具格局的英国文学史著”，虽有意“将历史意识和批评方面重视具体作品的态度结合起来”，但还是“淹没在他的材料之中，埋首于手稿，冷僻书籍，参考文献和传记的资料堆里，茫无头绪，广征博引”。^④《文学史》“历史意识”的匮乏，展示了它和英国经验主义的亲近关系。卜立德（David

① [加]巴纳德：《赫尔德的社会政治思想：在启蒙运动与政治浪漫主义之间》，李柯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23年，第195页。

② [英]以赛亚·伯林：《启蒙的三个批评者》，马寅卯、郑想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223页。

③ [美]雷内·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1卷，杨自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20年，第26页。

④ 同上书，第173—174页。

Edward Pollard)指出,这部作品更像是翟过去数十年阅读、翻译成果的荟萃^①,为一部“翻译集”^②。书中提及的作品,翟均做过翻译和评述,部分成果曾以单行本(如《聊斋志异》)或单篇文章(如《千字文》《三字经》《洗冤录》)的形式发表,部分则出现在他主编的《历史上的中国及其他概述》(*Historic China and Other Sketches*)、《古文珍选》(*Gems of Chinese Literature*)、《古今诗选》(*Chinese Poetry in English Verse*)等选集之中。如此,我们理解,翟对文学的定义,不是出于严格的学术考量或思考,而是基于个体的有限性,从自己过去的生活经验中调取了灵感和依据。以后,他也将这种阅读经验带向另一本史学作品——《中国绘画史导论》。他在序言中坦言:“本书旨在为人们了解中国艺术提供暂时之需,其中大部分内容均摘录于权威著作,它们首次被译成英文。”^③翟的这些举动,或许可以视为他定义“文学”/“艺术”的一种隐秘方式。他以“个人经验”搭建“集体传统”,有心无意之间呼应了日后伊恩·瓦特(Ian Watt)的观察。瓦特认为“小说”在18世纪末兴起,有一个重要的背景正是“用个人经验取代集体的传统作为现实的最权威的仲裁者的趋势也在日益增长”^④。

四、重复原则

一方面,我们可以把翟非系统的经验编排看成“后传教士时期汉学”的基本特点,同紧随其后的“专业汉学”相比,其个人化、感性化的内容要明确多于理性和理论;另一方面,这种“集诸碎锦”“联缀

① 翟夫子自道:“在过去25年的时间里,我一直都在翻译各种体裁的中国文学作品,我积累了大量足以完成这本著作的必要的素材。”参见葛桂录主编《中国古典文学的英国之旅——英国三大汉学家:翟理斯、韦利、霍克斯》,第90页。

② David Edward Pollard, “H. A. Giles and His Translations”, *Renditions*, No.40, Autumn 1993.

③ [英] 赫尔伯特·翟理斯:《中国绘画史导论》,赵成清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0年,第2页。

④ [美] 伊恩·P.瓦特:《小说的兴起:笛福、理查逊、菲尔丁研究》,高原、董红钧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第7页。

话柄”的讲史方式，也容易让人想起传统中国的类书、笔记体小说集和“故事集缀”型章回小说。以最后者为例，这类作品，杂集话柄，平铺直叙，“虽云长篇，颇同短制”。张蕾在研究中指出，“集缀”型叙事具有两大特征：众声喧哗和重复原则。她说：“故事集缀型章回小说中人物是具有统一意志的群体，他们的故事尽管纷繁多样，但并没有实质区别。”^①概言之，集缀型叙事展现了一种异同的辩证。套用到《文学史》之上，翟所举各例，彼此不同，但合力定义文学，形成复调。在个案选的选取上，他集中就诗歌、小说、戏剧以及经学、史学、字典编撰等内容做出说明，形成主题上的“重复”。此外，他对性别和童年问题的强调，也为“重复原则”的重要体现。

以女性作家而言，翟在书中提及8位。她们依序是班婕妤、杜秋娘、张国宾、沈束妻张氏、薛素素、赵彩姬、赵丽华、方维仪等。其中，张国宾生卒年不详，一般史书都作男性，但翟以女性视之，并指出其是受过教育的艺妓。（第197页）对这些为数不多的女作家的注目，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并不特别，但回到20世纪之初，其毋宁又有深意，表明女作家乃是与文学史同步“产生”的“历史意象”，而不是后来女性主义高张之际，所形成的一种“政治正确”的叙述立场。翟专门点出：“这样的例子足以说明中国文学的这一小分支。如果说这一小分支在真正耀眼佳作中还有不足，那至少也可以说，它绝不包含任何粗俗的东西。”（第245页）在翟看来，女性文学之所以值得表彰，关键在于其情感真挚。在论及清代诗歌时，翟“恶语相向”，认为其总体上矫揉造作、浅陋直白，不过批评过后，他旋即给出方维仪《死别离》的例子来终篇。尽管他的本意是想说明男性有深度的作品和女作家一样寥若晨星，但联系上下文，又可推知：翟对男性作家的期待落足于思想，而对女性作家则在意其情感表达。

翟尝试将性别和情感联系起来，是否直接受到维多利亚时期性别

^① 张蕾：《“故事集缀”型章回小说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17页。

观念的影响,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两者存在相似性一目了然。19世纪女性大量进入文学市场,“维多利亚期刊批评大量提到女小说家人数激增,又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印象”^①。这些作家中最为人所知的有勃朗特三姐妹(Emily Brontë & Charlotte Brontë & Anne Brontë)、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艾米莉·迪金森(Emily Dickinson)以及盖斯凯尔夫人(Elizabeth Gaskell)。评论界对她们的态度,往往倾向于认可作品表现的“善感,精致,得体,观察入微,精通家事,严肃的道德色调,以及对女性人物的了解”,这与他们对男性作家的期许截然不同。在其看来,男作家“令人满意的特点:力度,广度,独到,清晰,学识,抽象力,精明,阅历,幽默,对人性的知识,以及开放的心态”^②。同维多利亚时代的批评界并不回避女作家一样,翟一样关注中国文学史上的女性作者,而且双方都下意识地运用双重标准来拆解、检测作品,并为之贴上性别标签。面对匿名或用笔名发表的小说,这种做法并不十分可靠,一如翟将张国宾误认为女性,他的依据是张的作品对“性”传递了强烈兴趣。而通常,这一家庭伦理问题多被置于女性的领域内。进而言之,翟在讨论这些女作家的成绩时,多举其“见弃”“别离”“相思”等充满闺阁情愫的作品,对其社会性和思想性则不置一词。据此,就文学史学的角度来讲,翟对女作家的拔擢,具有开拓性,但是,它依然受到男女有别观念的左右,对作品做了二元化的定义和要求,暴露出局限或曰时代性。

在儿童的重复方面,翟至少提及25位作家的童年表现。这些记录中的多数对于揭示作家日后的成功,并没有实质意义,仅仅点出其幼年聪慧早熟,或对文学有一种亲近感。这显然是取法圣伯夫(Charles A.Sainte-Beuve)的传记批评所得。与泰纳大开大合的三要素相比,圣伯夫立足作家成长的小环境,说明作家和作品的紧密联系。白璧德

① [美]伊莱恩·肖瓦尔特:《她们自己的文学:英国女小说家:从勃朗特到莱辛》,韩敏中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4页。

② 同上书,第83页。

(Irving Babbitt)说:“圣伯夫最感兴趣的是活的个体。我相信,他的最原始的天才是在理解和表现活的个体时的一种奇妙的心理技巧。他在书的后面看到的是人,而在人自身,他则看到最有生气、最个人化、最能表现性格,总之是最有表现性的东西。”^①尽管翟为每个作家分配的篇幅有限,但他总不时提及童年表现,这是否暗示对翟而言,年幼时的聪颖是作家身上“最有表现力的东西”?平心而论,这些过于简略、客套的陈述,实在无助于证明作家价值。然而,它使我们警觉:翟的用意是否想表明连续的文学教育对于个体发展的重要性?

维多利亚时代,儿童成为舆论的焦点。达尔文提出进化论,家喻户晓,但遗憾没能找到从动物到人的中间化石形态。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Ernst Haeckel)大胆提出“重演论”(recapitulation theory),认为“个体发生就是种系发生短暂而迅速的重演”^②:生物胚胎的孕育过程,恰是物种进化的完美再现。重演论虽然减轻了人类对自己在有机宇宙中所处位置的担忧,但又引发了对童年发展的新焦虑:“个体对物种进化史的重演在出生时就完结了?还是说,会一直延续到儿童生命的头五年、十年或十五年?……如果我们早期的祖先仅仅是通过一系列形态上和智力上的偶然事件才成为人类,那么,儿童通往人类的道路也同样是不确定的吗?或者,如果可控的化,对于个体儿童乃至物种未来而言,哪一种早期童年或正规教育的经历是确保其成为人类之必须?”^③面对疑问,科学界和文学界反应迥异。斯宾塞(Herbert Spencer)认为既然儿童在重复物种的进化,那么,他们必须模仿祖先的心态来发展,“这包括细致的观察、果断的实验、耐心的试错与缜密的演绎和推理”。概言之,“科学”是儿童教育的关键所在。与之相对,文学家以为,兽性儿童如需人性化,文学,尤其是奇幻文学至关重要。

① [美]欧文·白璧德:《法国现代批评大师》,孙宜学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96—97页。

② [德]恩斯特·海克尔:《宇宙之谜》,袁志英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第70页。

③ [美]杰茜卡·斯特拉利:《维多利亚儿童文学中的进化与想象》,宋国芳、叶超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22年,第7—8页。

唯有借着幻想，儿童才能获得独特的进化机会，完善本性。^①1913年，翟撰文《童年、分娩和女性的地位》（“Childhood, Childbirth, and the Position of Women”）发表于《罅山笔记》（*Adversaria Sinica*）第10期，引起读者广泛关注。^②由文题可知，翟对女性和儿童的关注一以贯之。尽管贯穿《文学史》，翟未对“文学”的内涵给出具体定义，但通过强调作家敏慧的童年，他暗示文学的教化之功，或至少证明文学并不会对进化造成妨碍——这正是斯宾塞的观点，因为读书和进化所规定的发展过程毫不相干，强行引入有违“自然”。^③

翟对文学价值的追捧，其实也见诸他对小说、戏剧两大文类的推崇。论者在意《文学史》完全无视“宋词”这一巨大关目，以为其视野不够开阔。但转换到价值论的轨道上来看，我们理解翟的疏漏，也许是基于他对“宋词”功能性不强的判断。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约有60000部小说问世，有7000人认为自己是小说家”。小说无处不在，上至首相，下至厨娘，又无人不读小说。^④极致处，小说介入历史进程，推动国家转型，“比一切职业政客、政论家和道德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还要多”^⑤。日后，严复、梁启超等人尝试“以西化中”，推动小说界变革，每每强调“欧美化民，多由小说”^⑥。梁启超的名言便是：“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⑦学者们曾批评：“梁启超等向国人描绘的外国小说图像并不是

① 参见〔美〕杰茜卡·斯特拉利《维多利亚儿童文学中的进化与想象》，宋国芳、叶超译，第8—9页。

② 参见葛桂录主编《中国古典文学的英国之旅——英国三大汉学家：翟理斯、韦利、霍克斯》，第109页。

③ 参见〔美〕杰茜卡·斯特拉利《维多利亚儿童文学中的进化与想象》，宋国芳、叶超译，第9页。

④ 参见黄伟珍《英国维多利亚时期文学中的“家庭”政治》，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13页。

⑤ 陈礼珍：《盖斯凯尔小说中的维多利亚精神》，第5页。

⑥ 商务印书馆主人：《本馆编印〈绣像小说〉缘起》，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68页。

⑦ 任公：《译印政治小说序》，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第38页。

真实的。……很大程度是虚构的了。”^①但其实，回顾维多利亚时期英国小说写作的盛况，我们明了梁启超所言不虚。叶凯蒂也证明，“政治小说”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学类型，在欧美及日本有过辉煌历史，且都对政治形势有所推动。^②1901年，翟说明在文学史中“小说”位次不亚于诗歌。他是否受到梁启超的启发，我们无从得知，但他们的同频共振和欧美尤其是英国小说受到重视有着巨大关联。

结 语

1837—1901年是大英帝国的黄金时代。维多利亚女皇（Alexandrina Victoria）治下，英国在世界舞台上迅速崛起，并展现出一种独特的文化风貌和价值取向，史称“维多利亚精神”（Victorianism）。^③维多利亚时代，翟大部分时间逗留中国，但并未因此切断与母国的文化联系。他撰写中国文学史，每每和维多利亚精神，尤其是当中的科学、政治和文化话语发生对话。在华的侨居经验，为他的文学判断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视角和思路，使其能在进化论、“黄祸论”等主导型论述中发展出有别于主流的见解。而与此同时，他也受到维多利亚性别观、文学观和重演论的影响，在具体文类和作家的判别中表现出一定的时代局限性。贯穿《文学史》，翟未对“文学”做出明确、系统的定义和编排，但是对于文学何谓，以及文学和作家关系，他做出了有益的探索，表现出对文学功能论和传记批评的肯定。《文学史》不是具有唯一性的“起源”之作，它的发生和展开乃是在全球语境中进行的。它从欧洲和中国同步汲取写作的资源和论述依据，对中国文学做了一次较为完整的介绍，是为中国文学史的“开端”之作！

① 王宏志：《“以中化西”及“以西化中”：从翻译看晚清对西洋小说的接受》，陈子善、罗岗主编：《丽娃河畔论文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64页。

② 参见〔美〕叶凯蒂《晚清政治小说：一种世界性文学类型的迁移》，杨可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

③ 参见陈礼珍《盖斯凯尔小说中的维多利亚精神》，第1页。